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不能搬来一座『飞来峰』

□ 肖立辉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飞来峰”原是地质学名词，意为外来岩块。例如杭州灵隐寺前就有一座“飞来峰”，山体由石灰岩构成，看上去就好像是从远处直接飞来的一座山峰。习近平总书记借助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这个形象比喻，强调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不是外来移植的，而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因和外因在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原因，规定了事物发展的性质、基本趋势和方向；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的作用再大，也不能搬开内因独立地起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内因外因的基本原理为分析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政治制度具有独特性、多样性的特点，是不可能千篇一律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内生性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是从他国“飞来”的，而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甚嚣尘上。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另一种观点是“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把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搬过来”、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的想法，就是一种“飞来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只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外因条件，但不清楚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其症结是对本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不自信，总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实际上，只有扎根本土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摒弃“飞来峰”的思维方式。中国式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完善。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对丰富多彩的世界，要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另一方面，学习借鉴并不等于“全盘西化”，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民主”、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错误思潮的侵蚀影响，决不能囫圇吞枣、邯郸学步，否则就会行不通，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盲目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会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甚至会葬送国家的前途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我们没有必要照搬西方式的政治制度“飞来峰”，也不可能搬来“飞来峰”式的外来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反对“飞来峰”式的思维方式，坚持好、巩固好、完善好、发展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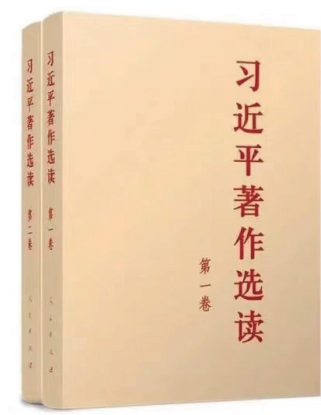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读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 唐爱军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是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要点，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阐述了事关意识形态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是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10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能体会到其中的深刻现实意义。

对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原创性贡献的鲜明表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工作地位的阐释上。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深刻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

“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对

意识形态工作地位的精准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虚的、软的、可有可无的，而是极端重要的，起到“思想防线”的重要作用。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充分认识到，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对如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篇重要文献从多个方面科学回答了如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这一重要命题，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举旗定向，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之所在。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贡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要坚持党性。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对于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两者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

传为主。进入新时代，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性，打破传统思维定势，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找准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不断提升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能够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同时，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切实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认真贯彻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使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成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坚强阵地，绝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要发扬斗争精神，始终站在意识形态斗争第一线，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做所谓“开明绅士”，不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始终同错误言行作不懈斗争。要加强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建设，以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以专门家的标准提升素质，以实干家的标准推进工作，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强调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宣传阐释好中国特色——做到“四个讲清楚”。这为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科学指引。

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要向全世界说明，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在于，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本质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向全世界阐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让外部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引导国际社会真正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对外宣传，要把过去、现在、未来贯通起来，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未来走向。

第一个“讲清楚”是阐明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由来；第二个“讲清楚”是阐明中华文化是形成中国特色的丰厚滋养；第三个“讲清楚”是阐明中华文化是我们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软实力；第四个“讲清楚”是阐明中华文化深厚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是相衔接、相贯通的。“四个讲清楚”的精神实质在于，我们要有自信，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范若愚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邓力群在《范若愚文集》的序中写道：“范若愚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工

用“记门牌”法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范若愚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唯一的工具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教育工

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活字典”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范若愚的治学之道

□ 谭学秋 奚广庆

主持编写出版我国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教材

范若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党培养了很多理论方面的优秀人才。曾受教于范若愚的赵曜评价他“理论功底深厚，知识渊博，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无论教学还是科研“不空洞，不枯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学贯中西的理论大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范若愚一面做好教学工作，一面结合教学以及党和国家的大问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52年，他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一部5万字的《〈共产党宣言〉解释》，把《共产党宣言》归纳为10个问题进行解释。后来又陆续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解释》等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品，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范若愚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但当时相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

经济学，其研究和教育工作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范若愚多次在中央党校和各种场合讲授科学社会主义专题，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的重要意义等。此后，中央党校和各级地方党校相继开设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1983年，在多年教学基础上，范若愚主持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

1981年，范若愚提议筹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并提出了一些重要指导原则，如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主张学会中既要有理论工作者，也要有实际工作者；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1983年，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正式成立，范若愚被选为学会会长。学会的成立，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建设学习型政党也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范若愚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

个显著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工具，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赵曜回忆：“范若愚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的教学与科研，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而且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体。”

1955年，范若愚代表中国科学院参加苏联科学院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50周年研讨会。他查阅大量资料，写就《第一次俄国革命和中国》一文，定稿后到正式宣读前他又改了10多遍。文章论述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革命中的这些策略，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论文宣读后又分别在《人民日报》和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范若愚发表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多篇重要论文，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经验。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最初根据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指出了这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原来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除了必须学习实现这一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律，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在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范若愚强调，今天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课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他还提出了衡量改革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把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积极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